



## 第一章 摇摇导摇摇论

长期以来,就人们从总体上认识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在全世界因地而异这个问题而言,中国一直占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对于中华民族的非凡气质,人们不乏自己的见解、兴趣和感情,但翔实可靠的材料和广泛深入的分析,却向属凤毛麟角。也许就是因为它众多无比的人口,举世无双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创造及其所达到的深度,中国一直使各方人士为之倾倒。然而,在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化的专业学术文献中,这个国家却历来是被忽视的对象。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大起大落,从现代纪元发轫之初的情形来看,似乎除去欧洲诸国及其繁衍地之外,倘使有哪个国家将走向现代化的话,那无疑就是中国。这里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按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1840年内如果不是惟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中国人在治理一个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社会方面,既无堪与平,更无出其右者,中国人此前在同化域外异族及其观念方面,也表现出他们是变通灵活的。然而,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不但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而且一百多年以来,甚至时至今日,它也未曾展现出任何堪称为本书所谓“成功的后来者”的迹象。人们早先对中国的期望已成泡影。确实,18世纪初,当欧洲现代化尚处在第一阶段时,18世纪那些中华帝国仰慕者们的乐观情绪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在1840—1850年的大部分岁月里,世界上又流行着对中国的另一种看法,以为该国的贫困和劣政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18世纪缘—1840年代那场横扫一切的太平天国叛乱无疑加深了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克服古老而经久的文化内在惰性,并将亿万之众引上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似乎决非

## 摇摇中国的现代化

任何一届中国政府能力之所及。

摇摇此间,随着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人们心中又曾燃起一线希望之光。孙中山的学说无疑是民国时期的主旋律,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并在本质上是主张共和与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于启蒙运动的理想之上,启蒙运动在美国和法国曾萌生过新形式的激进革命。这种乐观主义在1949年国民党创立国民政府之时,在1949年当处于逆境中的中国人民又有效地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时,都曾像电光石火,闪烁一时。但一次次燃起的希望却随着相继而来的国内分裂和外来干预而屡遭破灭。

1949年以后,中国的形象又如钟摆一样摆回来,中国迅速获得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形象,似乎可以通过加入苏联轨道而走向现代化。当时,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共同感觉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按照经过检验的苏联模式而实现现代化。尽管观察家们对于苏联那种竭泽而渔的工业化道路将使中国人及其传统付出多高的代价,看法不一,但他们都期待着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

在中苏联盟突然破裂,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吞噬了整个中国之后,世人对中国再次刮目相看。人们认为,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并同时能够避免许多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平等。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脱离公认的现代化必由之路而别开生面的做法将向世人证明,那种一提到现代化就言必称等级制、专门化、官僚集团和循序渐进的观念,势必要破产。根据这种见解,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性将被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所设计的那种能在显然地与与众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独特道路所否定。

后来,随着明显偏向于借助更为常见的途径来实现现代化的新领导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突然又作为一种更常规性现代化的试验案例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中国的经验将有助于回答实现现代化所需条件的规范性问题。世界各地人士都在以一种特有的兴趣,关注着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何以能成功地实现其一再宣称的现代化目标。

猿 尽管一般人在认识上有大幅度摇摆,而对中国的倾慕也一直历久不衰,但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学术性文献,不论是明确的还是含蓄的,都贫乏空泛且支离破碎。人们对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化道路上的现实机遇和障碍,几乎一无所知。撰写本书的同仁们相信,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进行分析大有文章可做。这样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来,可以将各有关学科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以便显示各个学科如何从不同角度去阐明同一类问题,而这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尚属少见。现代化的研究还必须深入

揭示中国研究中通常被割裂开来的各时代之间的关系,况且,这样也为一向被孤立起来予以研究的中国,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野。

## 何谓现代化

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的环境。纵贯全书,我们将一再论及那些通常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革因素,这些因素还经常被视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甚或界定性因素。它们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此处所列因素还能大大增加。究竟有多少因素应当涵盖进去,究竟各种指标的相对比率又应当定在什么水平上,对此尚无一致的认识。但是人们广泛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我们多少可以预见相应于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指标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sup>1</sup>。我们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此种说法准确与否必须通过研究才能确定;它不是定义,我们自然不应停留在未加确证的直觉上。

源

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无一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现代化的效应或者其某些方面的效应已遍及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已经现代化了。或许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永远也到达不了这一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而不少国家肯定在长时期内也还无法做到这一步。资源不可能充裕到足以支撑一切社会都实现高度的现代化。许多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 为满足那些喜好现代化简略指标的读者所需,我们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的程度。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动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的生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非动力资源的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拥有极为丰富的消费品的大众市场。

是所有的社会,都将遇到传统势力的反抗。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走向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在中国,影响现代化的因素,不管是本土的诸种前现代化条件,是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还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人推行的各项政策,都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种种因素的一模一样的复本。最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只适合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背景,即特殊的中国背景。然而,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这意味着,探求那些使得现代化成为可能的共同条件是大有益处的。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

各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之间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是我们称作先行者的那些早期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成功的后来者(诸如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循序渐进地转变了本国的各种本土因素,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由于中国亦属后来者,因此我们将比较的目光聚集于现代化后来者所遵循的道路上。

本书的设定是,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所有不是先行者的国家都成了后来者,而所有后来者又都发现,自己社会结构中的一些主要因素被那些与现代化相联系的巨大感召力和压力悄悄地破坏了。这种破坏过程未必就会对既存社会结构直接诉诸革命手段,尽管情况确实经常如此。即使是在较为温和的或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控制之下,新模式的引入也会彻底改变旧模式所赖以获得其稳定性的那种环境。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一般说来,在现代化历程中总会促使某些社会成员,甚至某些领导人,作出原教旨主义的反抗,即企图以真实的或理想的形式回复到往日的好时光,但这种企图绝不会成功。旧社会的某些因素在抵触并且影响现代化的过程,但也有许多其他因素被破坏了,而许多新的因素被引入了。

显然,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但外来模式更与其他现代化后来者的模式相似,而本土模式则反映着一个国家独具的历史背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就是本书所要考察的重要

论题之一。

在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中，“现代化”与“工业化”或“西化”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工业化意指制造业（包括重轻两种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发展过程的确会出现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但它只是诸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们相信，通过更进一步的广泛研究，通过反复考察同一社会各种不同要素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各社会的现代转变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当然，也可以赋予“工业化”一词以更宽泛的含义。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种因素去指称整个过程的做法；工业化一词的习惯用法往往是指我们所谓现代化的整个变化范围。就我们的目标而言，这个词的弱点在于其中缺乏农业过程的内涵。而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看，每公顷土地以及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农业产量指数的增加，至少与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业产量的增加具有同等的意义。

另一方面，“西化”一词是与先行者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些模式决不是非西方国家莫属，况且也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已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19世纪在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所发展出来的现代化模式的变种，现在可能正在中国周围地区及其内部展开。日本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社会，其原因与其说与现代化本身的要素有关，倒不如说与日本的独特国情有关。我们感到，西化意味着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特色。用西化来说明现代化，可以说是用词不当，但有人在使用西化一词时就往往使它含有此种更广泛的词义。

我们是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使用“成功的”和“后来者”这两个用来与其他社会相比较的概念的，即是说我们将它们作为描述概念而不是评价概念。本书涉及现代化的价值仅与下述事实有关：中国人在参与现代化过程时往往把早期的现代化视为成功，而把后起的现代化视为失败，这种观念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说某个社会在现代化事业上是成功的抑或是落后的，并不意味着判定这个社会的智慧和价值。的确，不少人把现代化过程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给弄颠倒了，尤其当观察者作远距离观察且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受到直接影响时，情况往往如此。

简而言之，用现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一种只要能证明有用便操将起来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的目的决不在于给我们所研究的现象妄加评断。我们只希望更充分地理解中国近来的社会变化，并在考察中国的基础上增进对于其他地区的社会变化的一般性理解。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在研究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现代变化上的可取性。

## 现代化的长期过程

没有一本书敢自诩填补了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变化知识的巨大空白。我们采取跨学科和多角度的方法,并以整合的方式考察通常被孤立对待的各历史阶段,试图基于中国研究新近露出的趋势,并开拓新的视野。本书分作两部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独立成篇,第一部分(第二至七章)主要讨论 19 世纪的中国,第二部分(第八至十三章)主要讨论 20 世纪的中国。

我们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是经过再三考虑而后敲定的。首先,既然我们决定要涉猎改革以及一直走到今天的现代化全过程所由以发生的历史基础,那就需要掉转笔锋去考察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回溯到清代中期,甚至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必须追寻到晚明时期,才能弄清中国在与现代化国家接触之前那种稳定的前现代状态和变化模式。我们可以证明,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前业已呈现的内部状况,基本上能说明现代化的各种速率和模式,就此而言,探索变化发生的历史背景乃是十分迫切的任务。此外,我们有必要借助史料来考察一下中国很早就具有的那些现代特征。中国在受到引发现代化的外来挑战之前几百年中的社会性质,乃本书主要关注所在。

其次,我们把中国历史上两个公认是恰如其分的分水岭年代——1840 年和 1911 年——连接起来。1840 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大门向着外来影响更大地敞开,但我们仍然决定不把 1840 年作为本书第二部分的起点。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导致大幅度转变的各项重大改革,只是在此后几十年才在中国展开。第一部分的每一章,均把清代中期的前现代环境与晚清逐渐发生变革的环境加以区别,但我们决不认为 19 世纪中叶的任何变革已因内部条件而与过去发生了彻底的决裂,无论这些变革会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这种彻底的决裂。

1911 年显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过去的断然决裂。我们决定在第二部分中将 1911 年前后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便弄清现代化遇到的各方面问题的连续性,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回应作一比较。现在盛行对 1911 年以后的中国进行断代研究,但我们并未让这种做法束缚手脚(第十四章除外),而是力图为理解当代中国寻找更广泛的视野。现代化,包括遗弃许多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顶梁柱,早在 1911 年以前便开始了。的确,更加广阔的时间框架使我们易于分辨出 1911 年在哪些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无疑也认为这一年是一个重大的

转折点,尤其在国家的协调和控制方面是如此。

1840—1861年这段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冲动出现新势头的时期。要求重大政策性变革的民众呼声响彻云霄,改良蜕除了王朝纪元的许多基本特征,革命摧毁了帝国秩序的断壁残垣。尽管本书各章并未恪守哪个特定的年头作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分界线,但我们确实大致上倾向于把1861年视为面临各项重大改革的前夜。

对于1861年以后的中国,我们的注意力从制约着中国回应外来现代化势力之能力的条件,转向旨在引导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力如何?现代化在相继好几个时期中的进展,其快慢如何?有哪些因素在短期内可以加速现代化而从长远观点来看却与现代化相悖?现代化在哪些方面是不平衡的?哪些走在前头,哪些落在后面?我们在第二部分也将考虑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历史遗产是如何与19世纪的各种政策发生联系的。

## 现代化的多层面性

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其与现代化概念相联系的兴趣所在,但一个社会在现代化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却是不考虑学科边界的,正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已发现的,要在某些方面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现代化,比如工业发展,同时又避免在其他方面经历深刻而且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采取了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这五个方面来考察各种变化,力求绘出一幅完整地描画这种相互关联、多向转变的图像。

我们从国际背景(第二章和第八章)开始入手,因为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后来者面对着一一种多变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承认或被迫承认,制定出一个基本上借鉴外国经验的大规模变革计划是重要的。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借鉴的同时却不去破坏宜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内条件,或者大体上能创造出这种条件。然而,中国人1840多年以来,从未受到实质性的外来挑战,向来以世界中心之国自居。即使面对着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征服,他们仍能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中央之国”。但自从19世纪起,中国之外的世界深深地冲击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施加给中国的各种压力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中国在这种紧要的转折关头所遇到的外在环境,是否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其他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中所遇到的外在环境有什么不同?中国此时所面临的环境是否或许更艰难?

## 撼摇中国的现代化

难道这种外来挑战的性质就在于它使中国人对现代化力量的感受不如其他国家人民的感受那样强烈吗？中国与现代化列强最富有意义的接触，在时机上有助于解释中国现代化转变的进程吗？

下列一组问题将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影响中国作出反应的历史因素。中国人那种看待外国人并与之打交道的独特传统限制了他们有效地进行借鉴的能力吗？中国人在对变化中的世界作出反应时，其世界观是一项重要因素吗？现代化受挫能归因于特殊的思维习惯吗？尚古心态阻碍着中国人抓住大好时机以创造一种新的未来吗？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将揭示出过去的传统，特别是其理智层面给现代化发展所施加的种种限制。

我们也要探索中国历任领导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是如何调整中国的同盟、贸易、投资和借贷的。那些借贷对于国内需要而言，是恰到好处呢，还是误入歧途？是未必不能生根呢，还是伤了元气？延续的闭关自守政策和对外结盟的政策对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和能力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考察了外部环境之后，我们便从四个领域深入研究中国内部的情况。第三章和第九章讨论中国的政治结构。我们在这里所关切的是，一个社会为实现蕴含在知识增长（这最初来源于对外交往）中的各种可能性，而运用公营和私营体制以控制并分配资源的这样一种能力的发展情况。我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一级，该级领导人选择政策并掌握变革。当然，我们对政治结构的注意也会延伸到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责权分配，延伸到诸如村社及血亲组织之类的分散单位。这些单位对于决定中央政府所追求和颁布的政策之成败，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结构对于现代化之所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执行什么政策并作出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

论及政治结构，通篇的论题就是对人和物的协调与控制。现有的协调和控制模式适合于现代化启动的条件吗？在清代，政治结构在素质和效能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影响了现代化必不可缺的控制，我们能弄清这些变化吗？堪称完美无缺的中国早期政治理想是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吗？保持着稳定的传统势力真的难以动摇吗？深长久远的协调和控制所赖以立足的其他结构，难道一碰上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革就会不堪一击吗？这些结构一旦垮台，是否能很快就找到替换对象？代复一代的现代化领导，包括 1959 年以后的各任共产主义领导又是如何促进协调和控制的？

国家的行动，本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在讨论政治结构的各章节中，将一再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治国无力的领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诸如 1959 年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一类

的国家决策,对现代化又造成了何种影响?就中国在 19 世纪的经历,我们要探索对现代化颇为重要的大众参与、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以及各利益集团在形成并表达自己观点时所具备的机会。政治领导是决定现代化的大体轮廓的首要因素吗?是否其他因素也具有同等的决定作用呢?

在第四和第十章中,我们将要考察经济结构及其增长。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伴之以农业优势的低落)对于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变革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成功的后来者的变革顺序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下列几步:第一,从对外交往的威胁中,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由于对外接触的诱惑力,产生了诉诸行动的强烈刺激性;第二,立志于进行扩大变革的新式现代化领导崛起;第三,极力追求经济增长,以致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上造成重大的结构性变革;第四,随着职业转变和劳动日益专门化,生活状况大大改观。经济搞得好坏,就成了检验领导集团实现现代化成败的试金石,也是预示其他各方面社会变革的基本指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增长最易于测量,而且测量的意义最易于阐释;其二,一旦经济增长(这是现代化的特殊魅力)未能兑现,其他方面的发展政策都可能化为空中楼阁,因为光靠进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都集中在筹集足够的投资基金并使各种活动和发展得以保持平衡的问题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着储备能力?商品流通能通过资源分配而促进经济增长吗?奖励结构是否有利于把稍有盈余的资源用于促进增长的活动?地方系统的经济活力能否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奠定充分的基础?偏重重工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在劳动未向城市大量转移,或消费未及大幅度增长情形下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仅仅靠劳动和其他资源的增加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涉及到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在清代,国家的有限作用(与其他前现代国家比较而言),以及对需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府认识不足,是否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在讨论经济问题的各章节中,我们将力求确定历史条件是否有利于增长,增长的速度如何,以及旨在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究竟有何等的效力。

我们在第四个领域即社会整合方面,将讨论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第五章和第八章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一般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人力资源的量和质,人力资源的空间分配和组织,再分配的各种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等。我们考虑的因素很多,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是现代化的一个指标,也可能是对现代化过程有所助益的一个方面。

讨论社会整合的章节所提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人际关系的一般模式。职业和技能已经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生分化了吗?居住模式和社会组织已经为促进现代化而充分有效地发展起来了吗?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中国共产党用以动员各种资源的鼓励手段又有效到何种程度?就社会整合的模式损害资源动员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当客观地说,纵使中国具备积极进取的领导,它也势必会遇到可怕的障碍,我们一定要从总的社会结构的角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在讨论社会整合的章节中,我们着重寻求回答有关调动和汇集各种资源的手段和刺激方面的问题。散存在地方社区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否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些资源深深埋置在地方上吗?中国人是否借助中央集权化的精英集团或通过税收和商业而发展出了各种机制,以便将这些资源调集到城市?那种动员资源的控制模式是否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在探求这些问题时,我们将逐一考察家庭、商业和国家组织,考察精英集团以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领域是知识和教育。第六章和第十二章表明,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发展以及知识通过教育而传播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任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会优先考虑吸收并扩展现代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和建设一个新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扫盲教育应普及到全体公民。在讨论中国的有关文献中,教育历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论题,其中既有对于与儒家教育系统形影不离的全国科举制长时期延误接受现代知识的探讨,也有对所谓四人帮时期的教育政策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思考。

一如其他前现代社会中的人民一样,许多中国人并非在学校接受教育,但几乎又与其他各国的情况都不同,受教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并受到极大的尊重。这种历史遗产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之间有何联系?智识活动在何种方式上有助于或有害于现代化?科举制度的意义何在?不久前提倡的又红又专其意图又何在?是想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吗?我们尝试着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以便考察一下情况是否像某些人指出的那样,知识和教育事业上的是非曲直在勾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显然,上述五个方面的单项研究无法涵摄本书提及的各学科所考察的全部主题。然而,这些主题提供了一种框架,它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宽泛而系统的方式去考察现代化文献所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

## 其他研究方法

我们当然很清楚 我们的研究方法并非研究中国现代各种变化的惟一途径 有些研究中国的文献就使用了这种或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断言 亚细亚社会本无启动现代化的固有能力 因而欧洲的渗透便成了这些社会走向现代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他们责怪殖民主义和责怪资本主义是一样激烈。但他们也认为 外国的渗透是那些不具备欧洲封建主义特征的国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另外不少受马克思和列宁影响的学者却认为 如果没有殖民主义以及与国际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新殖民主义剥削形式的存在 那些国家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会更快地成长起来的。从这种立场来看 正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 才使这些国家自身发展动力的运作连续受阻。还有不少人认为 亚细亚生产方式迫使中国这样的国家陷入了一种国家广泛控制的特殊发展模式之中。持这类观点的一派人认为 共产主义领袖必须小心翼翼地制订对策 以缓解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后果 另一派人则认为 共产党正是这种专制主义传统的合乎逻辑的继承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是形形色色的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们的共同主题是 亚洲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必须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关于采取这种革命行动的正确时机的解释又各不相同。其中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 一个国家必须首先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经历颇长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尔后才有可能引入社会主义。

近年来 有一些关切民族发展问题的学者把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和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解释成一种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照这种观点来看 直至引入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 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各种关系本质上都应当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来加以说明。于是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 其首要原因当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剥削 即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剥削 19世纪的中国史被描绘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 这种斗争终于在 1949年赢得了胜利。

我们并不否认 首先必须克服由本土精英集团和外国势力培植起来的某些依附模式 民族意志和资源才能为着现代化的目的而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在某些国家 这种依附模式根深蒂固 确实是实现现代化的最直接的障碍。然而 一旦扫除了这些障碍 现代化的基本困难仍将依然故我。分析这些遗

留下来的难题,首先应当了解各国内部的诸多状况。我们认为,除却在日本占领时期,依附关系并非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

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把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视为历史的原动力,并把现代知识造成的政治发展程度、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准看作是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状况的关键矢量。从这种观点引申出来的两条原则就使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第一条解释原则认为,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现代化学者对于前现代社会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领导人在接受现代知识并确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需的体制和政策方面,其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前现代社会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在程度上相去甚远,而且后来者还往往发现必须通过广泛地向更为现代化的国家借鉴,才能增强自身传统体制的适应性。在此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总的来说,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区分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第二条解释原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只能用最易获取的指标,即政治的、经济的、人口的以及其他指标(尽管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完全令人满意)来衡量,而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正如我们在以前的研究成果《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可以获致同样的发展水平。这里所以把两个名词都加上引号,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重差距极大,因此,用市场和计划的不同作用比用两种意识形态来描述实际情况更为恰当。公营部门的作用和其他制度性安排的作用一样,与其说与发展水平相关,不如说与某一社会的政治历史相关,与特殊的领导和意识形态的偶然选择有关。就我们迄今所知的证据来判断,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多方结合为现代化提供过行之有效的框架。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持现代化研究立场的学者对剥削以及与剥削有关的不正义现象的关切,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在国内国际政策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国家,要比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其人民更加具有乐善好施的特色。例如,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平等的主要因素,虽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其社会平等的程度可能会因政府政策而稍有差异。

弄清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方法上的不同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还应看到,他们讨论的是相同的课题,也具有许多相同的结论,并且彼此之间有不少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尽管坚持其中某一种方法的人,可能会认为坚持另一种方法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一无是处,但是不管提问者的世界观属于

哪一家 立足于实际经验基础上的研究是可以使他获得真知灼见的。

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看待国内变化的主导趋势与以前都大不相同了,即不再强调阶级斗争而是强调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它们都强调,如何利用当代知识给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提供的机会,乃是评价社会能力的标准。这种观点与现代化研究极为接近。

### 现代化的比较领域

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一向比关于其他大国的学术研究离时兴的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更远。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其盛行的观点所带有的那种中华中心论的倾向,恐怕并不比中国人自己传统上所持有的那种惟我独尊的观点差到哪儿去。另外一种极端的狭隘的观念同样令人失望,这种狭隘的研究只是依据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自以为是地对中国发表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而毫不顾及这些议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两种极端皆不可取。故而我们力求证明,最近几十年来,通过直接使用中国的原始资料而在中国历史方面所获得的丰富(但尚不够成熟)知识,为利用比较材料重构中国研究奠定了令人满意的基础;我们还要指出,对其他国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尽管在许多方面还称不上是最后结论,但它为把比较研究扩展到中国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本书将力图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共享的特征中,揭示出求索中国独具属性的出发点。

我们应当拿哪些国家与中国作比较呢?我们又如何才能把比较的倾向与实质上集中地研究中国的具体内容有机地融合起来呢?当然,若进行比较,纳入的国家越多越好,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所有的国家。我们宁可反复回到那些为本书作者熟悉也为读者所熟悉的国家。究竟选择哪些国家进行比较,应首先考虑到,中国按时序历经了高度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后来者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选择标准还包括一个国家的规模、历史的连续性、前现代的发展、转变的时机和性质、迅速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所知的前现代和现代化时期的状况。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甚至满足其中半数条件的国家,实乃凤毛麟角。显然,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可资充当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的理想化的历史实验室。然而,有两个国家,即俄国和日本,却有可能最切近于这种理想化的历史实验室。

很清楚，选择日俄对本书作者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撰写过《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之后，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亦便于参阅，尽管其中包括着我们自己的偏见和固执。除了得心应手之外，此种选择也还有其他理由。从人口和幅员来看，过去 100 年来真正达到中国标准哪怕 1/10 的国家，惟有印度。然而，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各邦分立的状态之中，其前现代发展，按照我们所研究的标准来说，不仅大成问题，且记载也很不全面。印度在现代化转变上步履蹒跚，对于研究中国本应采取何种做法才会加速其现代化这一课题，它实在不足为训。

相形之下，俄国不仅具有广袤的土地，而且具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其他标准。日本尽管国土很小，但人口一直属于世界上数量最多也最密集的国家之列。在 19 世纪，除印度之外，恐怕只有日本人口才抵得上中国总人口的 1/10。与中国和俄国不同，日本虽未曾经受过共产主义的领导，但在其他方面它显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中国的历史条件，也对中国的出路更具有启发性。

日俄两国中央一级政府的连续性也很突出。两国的现代化转变都起步于 19 世纪中叶，都未遭受过更加现代化国家那种直接的殖民统治。在以强有力政府指导转变方面，俄国的榜样比日本更典型。在日本，强有力的政府作用是在资本主义的大框架下发挥出来的。在把握外来现代化冲动的时机方面，日本比俄国更值得借鉴。或许，在后来者的队伍中，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大国惟有日本和俄国。

本书在进行比较时，将引证《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并将利用几位作者关于日本和俄国研究的基本材料。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第二章至第六章和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的许多段落中，我们间或要用比较的方式讨论中国。这些章节的标题和某些段落与前卷是一致的，这样有利于进行直接而经常的比较。第二，每一章都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段落作为总结。国际比较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和俄国，但也包括其他国家。第三，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明确地以比较的方式引申出本书的结论。在这些结论性的章节中，我们将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简略地）注意到中国、俄国和日本的经验对现代化总体研究路数的内在含义。这些研究包括（一）前现代社会通向现代化的各种条件（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现代化（三）当代的后来者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三个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都能从对中国的深入考察中获得教益。

关于中国与日本和俄国的许多比较，都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相对迟缓。我们在本书里始终都在寻找把中国和日俄两国区分开来的反差条件。既然日本和俄国在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只指明拖住中国现代化后腿的道理，显然

是不足以说明情况的,因而我们还要说明 1900 年以后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并且要寻找推进中国现代化前景的那些在早期是和日俄两国相似的东西。比较乃全书的主旨。

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 4000 年,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 19 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

被我们看作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亦曾在中国达到过很高的水平。最明显的,便是他们所发展出的那一套完全依据实绩而决定进退的官僚体制,直到 19 世纪,这支官僚队伍依然还是效率和能力的一个典范。若从以相对少量、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有效地处理庞杂问题的角度而言,中国官僚体制现在仍在某种意义上不失为一个榜样。1900 多年以前,中国人就表明自己有能力去调动资本、劳力和必然要牵涉到的计划资源,投入到公共工程的建设中去,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所有其他国家在 19 世纪之前连想都不敢想。中国那种首先依据学问和功绩而升迁的开放的阶级系统(至少在理想上是如此)足足维持了 4000 多年。的确,这种系统在过去 4000 年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败坏,但依然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不管人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高度文明”一词,反正中国至少和今日我们所谓的欧洲人或西方人同样早地达到了此种标准。未来世界的学者将发现,那种误以为欧洲文明在 19 或 20 世纪以前甚或在其后一段时间里堪与中国文明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中国文明之上的看法,只能用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不愿学习中国那种困难而微妙的语言的态度来加以解释。中国在兼容并蓄其他文化,甚至是征服者的文化方面曾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作为一个非现代社会,中国过去的识字率已达到非常之高的水准,商业、工业和市场活动总的来说也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最后,实用主义,即在杜威看来是属于西方现代化的哲学基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许多方面在 1900 年以来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常理。

然而,一俟中国人企图与外国人打交道,并应付现代化所带进的外国模式时,情况便似乎愈来愈不妙了。从 19 世纪初年直到 20 世纪中叶,世界上确有不少地区在解决现代化问题方面超过了中国。在整个亚洲,惟有中国人本不屑一顾的日本人,也就是中国人曾把文字、佛教和儒教传播给它并在 1900

## 摇摆中国的现代化

多年间为之充当文化楷模的那个日本民族，才具备对付那些新式现代化的冲击的优异能力。甚至到 19 世纪中叶之后，其他若干现代化的后起国家至少也不比中国做得差。

足以使我们感到惊诧并极大地激发我们好奇心的中国经历，其成因究竟何在？它是事件发生时的国际环境造成的，还是现代化过程本身的奇异性质决定的，抑或是中国文明某些重大方面所使然？至少在文化上，中国文明无疑是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完美的文明之一。上述三方面的原因肯定都有，但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可悲，主要是现代化过程和中国文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希望能在本书阐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见解。